



山东快书：山东人的“活广告”

□ 晓浩



武松打虎

前几年有河南人写了一本书，其中说了这么一种意思，同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，河南人的名声之所以不如山东人，关键在于山东人会为自己做广告，特别是山东快书《武松传》就是山东人最好的广告。

我同意他观点的一半，就是山东快书《武松传》几乎就是山东、山东人、山东话的标志符号，武松的性格、语言、习惯，无一不打上山东人的深深烙印。但是我又不同意他观点的另一半，山东人好不仅仅是因为《武松传》的传播，与其说武松代表了山东，倒不如说山东人把群体的性格特征赋予了这位打虎英雄更恰当。

“当哩个当，当哩个当，闲言碎语不多讲，表一表好汉武二郎。那武松，手掌一挥赛蒲扇，两眼一瞪像铃铛……”山东快书为什么曾经风靡大江南北，而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衰落了？是不是山东话的魅力在减弱？

山东快书的三个“源头”

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阴军是高元钧的徒孙，曾经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——牡丹表演奖。他认为，山东快书是惟一能表现山东地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曲艺形式，只要你一张嘴说句“当哩个当，当哩个当”，人家就能想到山东。可是，阴军担心的是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，这个艺术品种还能传承下去吗？

认识阴军后，我开始关心山东快书的历史与现状。我对这一凝聚了山东方言精粹的艺术形式充满了神往：哪一个省的方言能像山东快书这样红遍全国？

山东快书发源于山东省临清、济宁、兖州一带。最早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，有几百年的历史。有人说，山东快书是从河里的来的，这条河指的就是古代京杭大运河。山东古运河沿岸有七八个著名城镇，临清、济宁都是运河上的大码头，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，是一片艺术的沃土。这里具备了山东快书诞生与发展的要素：临清、济宁一带是梁山好汉的故乡，武松的故事广为流传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；商贾云集，生意之外他们需要精神生活，而且他们有着雄厚的资金和实力，养得起艺人；多种艺术形式荟萃，吸引着艺人前来“跑码头”。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和竞争，使得以《武松传》起家的山东快书应运而生。

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，有三种传说，即刘茂基说、赵大桅说和傅汉章说。刘茂基，相传是明万历年间人，山东快书孕育期的代表人物。他祖籍临清，现在这里被确认为山东快书的故

乡。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的塑像，就矗立在临清市大众公园的苍松翠柏之中。赵连甲亲口告诉过我，临清是山东快书的发祥地。山东快书以武松为主要内容，尽是搏杀厮拼，表演程式也离不开一个“武”字。刘茂基是个不得志的武举人，流落乡间，采集当地流传的武松故事，编成山东快书演唱。他的表演方式很“土”，没有服装和乐器，只是斜披一件大褂，手里敲打着两块瓦片。他有绝活，就是武功架子好看。

赵大桅的祖籍在济宁，这里是山东快书的另一发祥地。相传他是清咸丰年间的一个落魄文人，穷极无奈，只好卖艺为生。他会编词，粗通文墨和音乐，起初把武松的故事编成顺口溜演唱，后来吸取山东大鼓的“甯铜腔”，编成山东快书演唱。他用山东大鼓的梨花片做为伴奏乐器，这就是至今还在使用的鸳鸯板，说通俗点，就是两块薄铜板。他属于山东快书成熟期的代表人物，被誉为山东快书的“奠基人”。

傅汉章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。据山东快书老艺人介绍：清道光六年，山东有落第举子36人，归途中遇到大雨，滞留临清，为发泄胸中的怨气，他们以梁山好汉武松的故事为依据，编成《武松传》说唱。作者之一李长清将该书带回家乡在平。李长清发现表侄傅汉章很有演唱才能，便将全书传给了他。傅汉章对《武松传》加以充实，于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正式“撂地”演出，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。傅汉章是最早演出山东快书的艺人，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。

后来，傅汉章传艺于赵震及弟子魏玉河，遂形成两支，流传至今。魏玉河一支的著名艺人有弟子卢同武，再传至杨立德。杨立德擅长“俏口”、“贯口”，自成一家，被誉为“杨派”。赵震一支的著名艺人有戚永立，再传至高元钧。高元钧以注意刻画人物，表演生动风趣见长，被誉为“高派”。

山东快书始向全国发展，高元钧的推动作用很大。1950年3月，他从上海北上，开拓山东快书新的流传地区。先到天津，最初献艺于小梨园。天津号称曲艺之乡，观众艺术鉴赏力强，艺人站住脚不易。高元钧一炮打响。

1951年春节期期间，高元钧自天津应聘到北京西单游艺社献艺，使北京观众第一次见到了山东快书。当年冬季，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山东快书遂正式在北京落户。从1951年11月开始，高元钧等人在部队领导的倡导下，通过训练班的方式，以北京为基地，先后培养了200多名军内外山东快书演员，将这一曲艺表演形式推广到全军以至全国各地，山东快书在

部队里很受欢迎，既和高元钧的推广有关，也和山东快书歌唱英雄的传统和粗犷豪放的风格有关。高元钧的代表曲目有：《武松传》、《鲁达除霸》、《赵匡胤大闹马家店》等传统段子，还有《一车高粱米》、《抓俘虏》、《侦察兵》等现代作品。

山东快书为什么发展缓慢？

曾经风行大江南北的山东快书，目前确实有萎缩趋势。阴军这样告诉我。

他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感觉，来自于他的经历。作为孙镇业的弟子，阴军常去各地演出，而主办方总是告诉他：“弄点热闹的。”山东快书有故事，有包袱笑料，还有辅助部分，比较热闹的“包袱笑料”只是山东快书表演的一部分。阴军说，因为大多数观众只重视山东快书的“热闹”，而忽略了这门艺术其他的东西，导致自己演唱山东快书的时候，只能唱比较热闹的小段，比如《闹红灯》等。

有人说，由于方言的原因，山东以外地方的观众不一定能够听懂，这可能会阻碍山东快书的发展。阴军认为，以山东方言为主表演的山东快书，并不存在因为语言阻碍发展的问题，因为山东方言是我国北方语系的一个分支，与普通话的差别不大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能够听懂。

我觉得，山东快书这种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传媒之间存在着不适应现象。它是一种适应农业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，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，其不适应性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过去一个演员，一副鸳鸯板，田间地头，工厂车间，直接面对观众，形成了互动的气氛，一演可以一天；而现在的传媒更多的是电视、电影，或者是综合演出，如果只是山东快书专场，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看了。

阴军也认为，现在娱乐形式越来越丰富，分化了很大一部分山东快书的观众。另一方面，山东快书要求一人扮演多角，舞台要求简陋，场地不大，类似于现在话剧的小剧场演出；而现在的演出大多是大舞台，气氛要求热闹，



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

隆重，像相声、山东快书这种演员少、场面不大的艺术形式，很难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。

阴军还有一个观点：人才流失是影响山东快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现在演艺界的大腕中，有不少是从优秀的山东快书演员转行的，比较出名的有黄宏、张国立、笑林、卓林等。其中黄宏转行做小品演员之前，已经算得上是山东快书的大腕了。1979年，全国山东快书比赛在青岛举行，黄宏成为全国山东快书三个最佳演员之一，与他并列的一个是山东快书大师孙镇业，另一个是郭秋临（小品演员郭冬临的哥哥）。为什么山东快书大腕纷纷转行？阴军问过转行的山东快书演员，他们的回答是：山东快书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，唱山东快书挣不到钱啊。

这句话倒给我们以启示：以山东方言为特色的山东快书，应该寻找新的生存土壤了，或者说应该主动去适应社会和市场了。

山东话与山东快书

在谈到山东快书为什么有特色时，姜昆这样说：语言艺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，说山东快书一定要说山东话。普通话说说好话、棒子长，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……这谁听呀。所以说这种区域性的艺术一定要保持住。

方言化是山东快书的一大特色。它用简单爽快的语言描述的是山东普通百姓的生活，有一股憨气。

原山东省曲协主席刘礼分析说，山东快书为全国人民所接受，首先在于它有浓郁的地方特色——山东的字儿，山东的味儿，山东的风俗，山东的事儿。山东快书原无定名，有叫它“说武老二的”，也有叫它“说大个子的”，或者直接呼为“武老二”。“山东快书”是解放后起的正规“学名”。

山东快书的表演无布景、无道具、演员兼任奏，演员一人左手持鸳鸯板击节站唱，有“一人戏”之称。在表演中，不但生旦净末丑全由一人装扮，还要装虎装犬，文相武武等等都要具备才行。因此它的形式简通（便）灵活，尤其适合在工厂、农村、部队开展业余演出活动。

刘礼说，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，穿插一些过口白、夹白或较长的说白。语言明快风趣，情节生动，表情动作夸张，节奏较快，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武打故事。它的语言押韵合辙，朗朗上口，跟诗词一样流畅。韵文还有其他语言不可代替的长处，它有利于人们进行独特生动的表达。描述武松的时候，词是这样的：

身子高大一丈二，膀子一弓有力量，脑袋就像量麦斗，二目一瞪赛茶缸。胳膊伸开房上摆，皮鞭一撻像铁夯，巴掌伸开簸箕大，手指头，叶叶愣愣棒槌长。

演到这里，台下都会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如果不是这种似说似唱的表演技巧，恐怕以任何方式也难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。

就高元钧和杨立德来说，两个人的语言特色也各不相同。高元钧的表演憨中见巧，刚柔相济，张弛有致，举重若轻，轻松风趣中透着隽永与灵气。由于山东快书的语言富于乡土气息，从而使其表演也含着质朴与亲切。杨立德的艺术风格特色是俏皮和细腻。他要求快书有一种弹性，吐词清楚，有力，像出膛的子弹那样，另外要有美感，柔和，动听。

赵廷甲记得杨立德说快书的体会：第一，快书不是评书、鼓书，是有节奏的韵诵，快书就是“快数”；第二，保持山东快书地方语言和乡土气息的本色，正是它的民族性和民间艺术的特色；第三，说快书是以说为主，表演、动作是辅助性的，起锦上添花的作用。说，要张口脆，发音准，咬字清，行腔俏……

山东话让他们这么一说，还真是不一样了。

兵学奥秘

未战而先胜

□ 赵海军

孙子说，通过激烈的战斗而取得胜利，即使天下人都说好，也根本谈不上善战。

那么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善战呢？

孙子指出，古时候所说的善战者，总是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。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费解：敌人容易战胜，还谈得上什么善战呢？且看孙子的分析。他指出，真正的善战者，首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再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。他们总是想方设法，在决战的时候使敌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。因此，善战者打胜仗，从不需要显示奇特的战法。他们既没有睿智的名声，也没有勇武的武功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，他们的胜利是不会出现差错的。之所以不会出现差错，是因为他们的措施必然会导致胜利，战胜的是已处于失败境地的敌人！真正的善战者，是在战前便创造了战胜敌人的条件，因此在一般人看来，胜利的取得便是很容易的了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孙子指出，胜利的军队是先有了取胜的把握，然后再寻求与敌人交战；而失败的军队则是先盲目交战，然后企图在作战中侥幸获胜。

西晋灭吴，是中国历史上成功跨越长江天险，完成统一大业典范，也是对孙子“胜于易胜”思想的成功运用。这场战争的真正策划者，是羊祜。在镇守襄阳时，他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，训练军队，另一方面采取攻心之策，致使吴人归降的越来越多。鉴于曹操赤壁之战因军队不习水战而失败的教训，羊祜建议晋武帝司马炎，以王濬为益州刺史，负责制造船只，训练水师。公元276年，羊祜上《平吴疏》，在分析敌我双方作战态势的基础上，提出了水陆俱下、六路并进的作战计划。公元279年，晋军按照羊祜的计划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一举灭吴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。可以说，是战前一系列充分的准备，使晋军造成了对吴作战的“胜于易胜”之势，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。在庆功宴上，司马炎感慨地说：“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啊！”

美军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，进行了精心的准备。对于参战的主要装备，如直升机、坦克等，事先都进行了适应沙漠作战的改造，并对参战部队作了各种适应性的训练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还不惜重金，通过间谍收买了许多伊拉克和美国卫队的高官。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倒戈，才使人们普遍认为的巴格达巷战没有出现。美军伊拉克战争的全胜，可以说是孙子“胜于易胜”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。

孙子的这一思想，用现代军事学的术语来说，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。战争靠得不是匹夫之勇，重要的是进行战前的谋划，做到未战而先胜。

海岱一方

胶东渔灯节

□ 陈文念

渔灯节是胶东渔民的节日。它的形成不过三百年历史，但发展演变丰富了许多内容。现在的渔灯节已是一个热闹喧嚣、富于地方文化的渔民盛典，已经成为了渔民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鲜明的渔家特色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是其传统民俗文化不能涵盖的。

“渔灯节”最早是从我国传统的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派生出来的，正月十五老百姓讲究点灯、送灯，送灯发展到“海神庙”、“龙王庙”。后来，渔民发展成把灯送到海上，随浪而飘，一来祈盼一帆风顺，二来盼“海神龙王”能带来好运。再后来，渔民们选中正月十三和十四，作为自己的“送灯节”，这个“节”民间就叫做“渔灯节”。渔灯节是流行于蓬莱渔村——山后初家、山后陈家、山后李家、山后顾家、沙窝孙家和产洋等6个渔村的共同节日。

渔民们先把五颜六色的彩旗挂在桅杆顶上，在船上贴上祈盼一帆风顺的对联，在船各处贴上斗方“福”字，以求“福”到船家。正月十三这天，渔民们在自家准备好酒菜，杀好猪，蒸好着彩的饽饽，把猪头、饽饽、酒菜、供香、佛腊、烧纸、鞭炮等等都放置在几个“柳斗”上，摆好后在猪头上洒一点猪血，或在“柳斗”梁上系上红绸彩花，这两种做法的意思是“发血财”、“挂彩(财)”。祭拜供品摆好后，渔民们自家开始大摆酒宴，一来祝当年丰收，二来祝来年更上一层楼。午后一点左右，渔民们开始各自从自家出发，抬着供品“柳斗”一路走一路放鞭炮，随之而来助兴的秧歌队，更是伴随着锣鼓点扭个沸沸扬扬，加上观看的人群，祭海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码头。

码头上，数百只船连靠在一起，渔民们迅速把鞭炮、供品及“柳斗”一起送到船上，然后挂鞭炮，所有的桅杆、吊杆上都挂满了两三万头的鞭炮。这时，锣鼓响起，船家开始陆续燃放鞭炮，岸上的渔民开始载歌载舞随意拿一红绸，系于腰间，随“奏点”扭摆，秧歌队则更是欢跳无比。然后，所有来人分年岁、辈份大小，朝着象征着“海神龙王”的方向叩拜后，整个仪式就结束了。

渔灯节一直作为当地渔民的传统节日传承了下来，即使在文革期间，龙王庙被推倒了，渔灯节也没有停止。现在，除了传统节目唱大戏之外，渔灯节还把渔家歌舞、大秧歌等特色节目引入了节日庆典，使得整个节日充满了时代气息。正因为其深具人文魅力，2006年，渔灯节被列入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□ 责任编辑 于岸青

群贤毕至

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高传珠

□ 牛新元 王炳毅

颇有好奇心和器重。

高传珠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、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秘书，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欧洲考察特派员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，南昌行营设计委员等高级职务。由于他是北方人，凡有北方军政高级人物或他们的代表到南京晋见蒋介石，高传珠均参与接待。蒋介石为了拉拢北方要员和将领为其效忠，凡前来晋见者均得其馈赠银元一千到两千不等，由高传珠负责办理。他奉命行事，借此结识了不少要员和将领。

高传珠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作为非常钦佩，暗地里做了许多有益于我党的工作。1935年初，蒋介石实行“文化围剿”，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，与高传珠有过几次接触的山东同乡，知名作家聂绀弩，在上海参加左联我地下党组织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中统特务逮捕，危在旦夕，高传珠得知后，利用职权和影响力，赶紧向侍从室主任钱士钧打了招呼，钱士钧抹不开面子积极通融，聂很快得到释放，幸免一死。

1936年12月12日，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的第三天，国民政府还未得知，高传珠奉宋美龄旨意，自南京坐火车去西安，随身带了不少供蒋介石

在西安过50岁生日的礼品和重要文件。在徐州停车时，高传珠发现气氛非常紧张，并听到人们“扣了，扣了”的议论，经打听，才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将军监禁了。高传珠进退两难，只好在徐州暂住，很快接到了宋美龄召其返回南京与家人团聚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高被分配到南京药学院担任俄文、英文教授。他高度敬业、勤勤恳恳，在倾心教学的同时，翻译出版了《共产主义道德》、《少年先锋队组织与训练》、《辩证法》、《贫农的儿子》等外国著作。为解放初各界的学习和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57年后的二十多年中，高受到了不公正对待，“文革”期间遭罪更多。而他在逆境中仍勤奋学习和工作，忠贞不渝地拥护我党的领导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高得以平反。他精神焕发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不仅承担起全国医药系统出国预备人员的英语培训，并积极推动本院教师们的英语学习，还担任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民革委员，深受爱戴。高晚年离休在家后，为祖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的统一，但因疾病缠身而未遂愿。1985年5月中旬，高传珠因病辞世，终年82岁。